

胡適思想批判

(論文彙編)

第一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胡適思想批判

(論文集編)

第一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6號

遼寧人民出版社重印 (瀋陽市馬路溝)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第一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135·850×1160 32開·7 3/4 印張·193,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瀋陽第三次印刷

印數：5,071—12,080 定價：0.68元

出版者說明

對胡適派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思想戰綫上的一場極為嚴重的鬥爭。這鬥爭現在已經初步展開了。我們為適應讀者的需要，把報紙、刊物上發表的有關的文章陸續編印出版。這第一輯所收集的是一九五四年的文章，分為四個部分。每一部分的編排，基本上是按發表時間先後為序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

目 次

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關於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

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 (3)

三點建議……………郭沫若 (7)

* * *

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汪子嵩等 (20)

“五四”運動前後胡適的政治面目……………曾文經 (36)

五四運動中的胡適和杜威……………王若水 (47)

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李 達 (55)

* * *

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王若水 (67)

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方法批判……………任繼愈 (77)

肅清學術研究中實用主義方法論的毒害……………陳元暉 (93)

批判胡適反動的歷史觀……………周一良 (107)

肅清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思想

實用主義的影響……………楊正典 (115)

批判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孫定國 (126)

引論

關於方法論的批判

* * *

我們對於“紅樓夢”研究的初步

意見 (山東大學教師集體討論)…………… (179)

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的毒害……………陸侃如 (189)

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的學術觀點和

他的思想方法……………游國恩 (194)

批判胡適的文學觀點和治學方法……………羅根澤 (203)

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李長之 (213)

胡適思想的反動本質和它在文藝界的流毒……………蔡 儀 (229)

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關於文化學術界 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 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

自從在“紅樓夢”一書中以俞平伯爲代表的胡適派資產階級錯誤思想被揭露以來，已經引起了社會人士的極大注意；首都文化學術界正在針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討論與批判。爲此，記者於日前訪問了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郭沫若院長對文化學術界討論“紅樓夢”研究中的問題表示異常關切，並就這一問題發表了重要的意見。

郭沫若院長認爲，由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所引起的討論，是當前文化學術界的一個重大事件。他說，“這不僅僅是對於俞平伯本人、或者對於有關‘紅樓夢’研究進行討論和批判的問題，而應該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鬥爭；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

郭沫若院長希望文化學術界能够很好地來展開這個問題的討論。他說：“討論的範圍要廣泛，應當不限於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方面，而應當把文化學術界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去；在文化學術界的廣大的領域中，無論是在歷史學、哲學、經濟學、建築藝術、語言學、教育學乃至於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個思想鬥爭。作家們、科學家們、文學研究工作者、報紙雜誌的編輯人員，都應當毫無例外地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

他說：“五年來，我們在思想鬥爭上、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曾作了不少工作，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還是存在缺點

的。首先是批評和討論的風氣就不够旺盛。新中國建立以來，國家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作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相形之下，文化學術界的空氣却相當沉寂，很少看見批評和自我批評，彷彿文化學術界已經是天下太平、萬事大吉了。實際上是不是真正如此呢？是不是敵對的思想就已經完全肅清了呢？顯然不是這樣。三年以前進行的‘武訓傳’的討論，曾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可惜那時沒有把這一討論廣泛地深入到文化領域的各方面去，討論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紅樓夢’研究中的問題，應該是繼‘武訓傳’以後，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在文化學術方面的又一次暴露。由此可以證明，我們的文化學術界並不是天下太平、沒有什麼問題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問題。”

郭沫若院長接着分析了胡適的反動哲學的遺毒對中國文化學術界的影響。他指出：“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着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佈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

郭沫若院長接着舉出一九五一年本報“學術”副刊發表朱東潤研究屈原文章的事例來加以說明。他說：“‘學術’副刊曾經先後以六期的篇幅刊載朱東潤研究屈原的文章。朱東潤研究屈原的觀點和方法基本上是胡適的一套，我曾經在‘學術’上寫過文章批評朱東潤。但有許多老朋友看了我的文章以後，反而說我作的‘太過火了’。研究屈原的專家對於朱東潤的見解沒有反駁，對我的見解也沒有支持。我至今都引為詫異。”

他進一步指出：“幾年以來，文化學術界由於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使大家得到很大好處，這一點是完全肯定的。但也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有些人雖然也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上却並沒有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這些人講起話或者寫起文章來，却慣於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術語

和摘引毛主席的話來裝飾自己。這些人真正是作到‘全身武裝’了，可惜就是思想上沒有武裝起來；這種人正像京劇‘甘露寺’中的賈化一樣，頂盔貫甲、刀劍在身，一旦聽到吳國太喝令傳賈化，這位‘全身武裝’的將軍立刻就下跪求饒了。我們現在不是也能够看到許多賈化式的人物嗎？”

他說：“爲了使得這一次的思想鬥爭很好的展開，我們一定要首先糾正和批評那種自行繳械的投降主義。絕不能放鬆這個思想鬥爭。我們需要團結，但團結也是需要鬥爭的。同時還要充分的開展自由討論。一般來說，我們對於批評是不大習慣的，一討論就會變成吵架，一批評就要罵人；這使大家多少對於批評有些厭惡，避免討論，害怕批評。這都是要努力來克服的。在自由討論中，要打破崇拜權威的思想，‘大人物’與‘小人物’要一律平等看待，在真理面前，對任何權威都不應該客氣。在討論中還有另一種情況是，凡是有共產黨員出來講話的，有人就不加考慮的一概認爲是對，這是一種市儈的習氣。實際上，服從黨的領導並不等於是服從每一位黨員個人的意見。黨員個人的意見並不是沒有錯誤的。一個人儘管不是黨員，只要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看出了問題，同樣可以出來批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客觀的，虛心的，實事求是的，他們熱愛真理、反對主觀和武斷。只有資產階級的反動文人如胡適之流才是最大的‘武斷’家。胡適的所謂‘大胆假設、小心求證’，說穿了就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論。按照胡適的‘理論’，人們就可以任意地來‘大胆假設’一些胡說，去挖空思想‘求證’；故所謂‘大胆假設，小心求證’，不過是用來證實他主觀地假設出來的東西而已。馬克思主義者和這種唯心論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點，既然自由討論是爲求得真理，因此在討論時，就應當有批評，也要有反批評；對於即使是少數人的意見也不應當輕視。在學術討論上是不能允許‘無原則地少數服從多數’的。要傾聽少數人的意見，同時也應當允許少數人堅持自己的主張。正確的主張往往是由少數人開始，而終於把

不正確的定案推翻。”

郭沫若院長非常重視由這次“紅樓夢”的討論而揭露出來的另一個問題，即忽視和阻礙新生力量成長的資產階級的老爺態度。他說：“這種現象是相當普遍的，在我們文化學術機關中一般對青年都不够重視；不去愛護和培植新生力量，反而對新生力量採取排斥和輕視的態度，這無論對文化學術的發展，或是對整個國家建設事業都是極端有害的。這次寫文章批判俞平伯錯誤思想的李希凡、藍翎兩位同志，他們的年齡都只有二十多歲，俞平伯研究“紅樓夢”三十年，當他開始進行研究時，李、藍兩位同志尚未出世，但他們勇敢地而且正確地揭露了俞平伯的錯誤。這一件事實使我們深深感到，新生力量是多麼蓬勃，我們又應當如何努力來愛護和扶植這種新生的力量。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確實是極犀利的武器。只要你的思想、立場、方法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根據的，就可以在短時期內接觸到所研究的問題的核心，假如不是這樣，那就如俞平伯先生一樣，儘管研究了三十年，那就只好是‘愈研究愈糊塗’了。”

郭沫若院長最後強調說：“自由的學術討論是非常必要的。文化學術界應該把這種討論充分展開，並使之經常化。要在自由討論中，培養充分的自由討論的精神，樹立起一定的制度，並要加意扶植新生力量。這樣才能够肅清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這樣才能够使國家的文化學術事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不斷地向前推進。”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光明日報”）

（編者按：本文轉載時，曾經郭沫若院長略加修改。）

三 點 建 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

郭 沫 若

(一)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開了八次大會，足足討論了四個整天。我們批評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紅樓夢”的方法，也檢查了“文藝報”的編輯工作，發言的人很踴躍，很有準備，一般地都做到了暢所欲言的地步。特別是剛才周揚同志的發言，我認為是具有總結性的。他的見解很全面，很具體，很正確，理直氣壯，很有力量，我完全同意。這一次的討論是富有教育意義的，是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嚴重的思想鬥爭，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繼續開展，是適應當前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文化動員。

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前要用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本來是不足怪的事情。三十年前，像我們這樣年輩而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們，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真要算是鳳毛麟角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成為了問題的，是他三十年來，特別是自解放以來，在思想、立場和方法上，都沒有什麼改變。這種情況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俞平伯先生對王佩璋的文章的刪改上。那表露了俞平伯先生不僅沒有擺脫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而且還有濃厚的封建思想的殘餘。俞先生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決心進行新我對舊我的鬥爭。我們希望俞先生的新我能夠獲得鬥爭的勝利。

解放以來，我們雖然進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進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內，並沒有上昇到能够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我們懈怠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放任了並助長了這種錯誤思想，甚至還成爲了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等年青一輩的同志們掌握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對這種錯誤思想進行了犀利的批判的時候，我們不僅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反而壓抑了他們。這就使得問題更加嚴重了。“文藝報”編輯部的同志們已經進行了檢討，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已經決定，準備妥善地處理“文藝報”所犯的錯誤。

好些朋友在發言中都提到“文藝報”編輯部的錯誤在文藝工作的領導方面也不能沒有責任，我完全同意。我明白認識着自己應該負的責任就很大。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看過。李希凡、藍翎兩位同志的文章是引起了注意之後我才追看的。“文藝報”和“文學遺產”對於李、藍文章的按語，也是在袁水拍同志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的文章之後我才追看的。這就充分地表明了我自己在思想鬥爭上的漠不關心。

自己被推選爲文聯主席，對於文聯機關報所犯的錯誤，能够說“事不關己”嗎？能够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嗎？那是不能够的。“文藝報”所犯的錯誤是我們大家的錯誤，也是我的錯誤。我要感謝領導着我們的黨，領導着我們的黨中央，適時地揭發了我們的錯誤，爲我們撞出了警鐘，使我們在錯誤面前睜開了眼睛。面對着以往的錯誤，我們今後應該怎麼辦？怎麼樣來改正我們的錯誤，補救我們的缺點？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

經過四天的集體討論，在怎樣來改正我們的錯誤上，我感覺着我們已經得到了這樣的一些共同認識：

第一、我們應該堅決地展開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

第二、我們應該廣泛地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提倡建設性

的批評；

第三、我們應該加緊扶植新生力量。

請允許我根據這三點認識來表達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二)

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是刻不容緩的嚴重的思想鬥爭。買辦資產階級的存在、帝國主義的控制雖然跟着舊中國的死亡而消滅了，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無論在文藝界或學術界，乃至在我們自己的腦子裏，都還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它的潛在勢力。我們不僅沒有和根推翻它，甚至還時時迴護着它。因此在我們從事文藝實踐或者學術實踐的時候，這種錯誤思想，就每每在不知不覺之間冒出頭來。

一九五一年我們曾經進行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第一次揭發。在電影“武訓傳”開始放映的當時，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好些朋友們都沒有看出它的反動性，還曾經加以讚揚。經過那一次的批判，使我們警覺到思想上的毛病，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但可惜那一次的批判沒有充分地展開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去，時過境遷，批判的聲浪逐漸消沉了，各人的警覺也就逐漸鬆懈了。

目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是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又一次揭發。這一次的情況是怎樣呢？大家是已經熟悉的，我們所犯的錯誤和電影“武訓傳”放映當時所犯的錯誤並沒有兩樣；而且在這一次的錯誤當中却又有新的成分增加，那就是抑制了蓬蓬勃勃的新生力量。錯誤不僅沒有改正，反而有新的滋長。這不就證明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是有它的根深蒂固的潛在勢力，我們有不少的人事實上不外是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嗎？

中國近三十年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這是一般所公認的。胡適在解放前曾經被人稱為“聖人”，稱為“當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國主義的扶植，成為了買辦資產階級第一

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弟難兄，倒真是有點像“兩峯對峙，雙水分流”。胡適這個頭等戰爭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潛在勢力是怎樣呢？電影“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思想立場都和胡適的反動思想有密切的關聯。把反封建社會的現實主義的古典傑作“紅樓夢”說成爲個人懺悔的是胡適，把宣揚改良主義的封建社會的忠實奴才武訓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也正是胡適。胡適的影響，胡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依然有不容忽視的潛在勢力，在這兩次的揭發中不就很具體地表露了出來嗎？

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同志的“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扼要地把胡適所信奉的實驗主義的反動性和它的唯心論的本質揭露了，我認爲是值得特別重視的一篇文章。我在這裏只想補充一兩點通俗的說明。

胡適在進行他的研究工作上所販賣的那兩句話，所謂“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自己吹噓，這就是科學的方法。好些人一直到今天都還受着這種研究方法的影響。前幾天就有人向我問過：這種方法爲什麼就是唯心論的方法？我的回答是這樣：這是把科學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學是允許假設的，科學當然更着重實證。假設是什麼？假設是從不充分的證據所歸納出來的初步的意見。它還不能成爲定論，但假如積累了更多的證據或經得起反證，它有成爲定論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學家倒是採取着相反的態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設，大胆的反證”。

胡適根本不懂得科學。但他是反動哲學唯心論實驗主義的信奉者，他跟着他的老師美國的實驗主義者的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學方法也作了唯心論的歪曲。他大胆地假設一些怪論，再挖空心思去找證據，證實這些怪論。那就是先有成見的牽強附會，我田引水。他的假設就是結論，結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觀的、片面的、武斷的產物。胡適就是以這樣的方法和態度，否認了屈原

的存在，否認了“紅樓夢”的對封建社會的批判，否認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否認了中國封建制度的存在，否認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他曾經主張“全盤西化、全盤接受”。他曾經說過：“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他這位自封的“高明”的“好漢”，就是想牽着我們的鼻子走，一同去做花旗順民。我們的鼻子呢？摩一摩看是有點危險的，沒有辦法全盤否認：沒有被這樣一位自封的“好漢”牽着。

其次是杜威所說的“有效即真理”，我認為，那不外就是“強權即公道”。因為對資產階級統治者，對帝國主義好戰分子，被認為最“有效”的就是橫行霸道。那就是杜勒斯、麥卡錫之流所奉的真理了。此所以實驗主義是最反動的哲學思想，能夠在美國吃香。此所以宣揚實驗主義的胡適，不外是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

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說法：“戰鬥的火力不能不對準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認清胡適思想的反動性，清除他的影響，是文化界當前的任務”。

我在這裏要順便報告一項消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在上星期四已經開過一次聯席會議，通過了一項聯合召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的計劃。我們擬定了九項內容，分別批判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和其他有關的問題。每項問題由主要研究人寫成文章，公開報告，並進行討論。我們想用這樣的辦法，把胡適的反動思想在文藝界和學術界的遺毒，加以徹底的清除。我籲請各位朋友注意這件事，請盡力協助，讓我們能夠勝利地來完成這項共同的戰鬥任務。

（三）

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這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這和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是應該有所區別的。對資產階級錯誤思

想的批判，是一項迫切的對敵戰鬥，我們的目的一定盡可能迅速地把這種錯誤思想肅清，再不能允許它有存在的自由。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可以說還是在揭發錯誤階段上的不同意見的論爭，經過論爭的結果，由不同之中而得出同，辨別誰是誰非，以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如果正確的結論一時得不出，儘可以使不同的意見在一定的時期內同時存在。不同意見的同時存在並不一定會引起思想上的混亂，因為矛盾在真理的照明之下總是要得到解決的。我們的任務就是根據真理來促進矛盾的解決。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可能產生，又需要在新的情況之下給予解決。這樣蟬聯下去，就使我們的學術水平和文化水平不斷提高。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凡是自由討論的風氣旺盛的時代，學術的發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學術的進步，連社會的發展也因而停頓了。

在紀元前四世紀至三世紀末期的戰國時代，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是自由討論最旺盛的時代。那時代的周秦諸子差不多每一位都是雄辯家，都是文章的能手，他們彼此之間的論爭是很激烈的，形成了所謂“百家爭鳴”的情況。因而那個時代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也就形成了一個特出的高峯。

在長期停頓的封建社會中，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好幾次大規模的自由論爭。例如紀元前八一年漢昭帝始元六年的鹽鐵議便是有名的一例。當時漢朝的中央政府召集了天下的開明紳士所謂“賢良”和孔孟之徒的讀書人所謂“文學”六十多位聚集到京城，和御史大夫桑弘羊辯論鹽、鐵和酒的專賣政策。從民間來的代表地主和工商業家利益的人們是反對政府所執行的這項政策的，大大地展開了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一場論爭。論爭的結果，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是儒家思想佔了上風。但有了那一次的討論會，却產生了一項值得重視的文化成果，便是桓寬的“鹽鐵論”。桓寬的這部著作被一般人誤解為經濟論文或者會議記錄，其實並不是那樣。那是桓寬在若干年之後的宣帝時代（紀元

前七〇年左右)根據會議記錄提煉出來的一部對話式的文學作品。那裏面有典型人物的創造。把六十多位代表地主階級與工商業界的民間代表,概括地抽象成為了所謂“賢良”與所謂“文學”的兩個人。把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形象,特別在他的思想方面,刻劃得相當生動。因此,我在這裏要順便向研究古典文學的朋友們請求:請把桓寬的“鹽鐵論”作為寫經濟題材的文學作品處理,在我們講漢文學史的時候,千切不要再忘記了這樣一部最古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存在。

紀元五八二年至五八八年隋文帝的開皇年間也曾經舉行過大規模的討論音樂的會議。參加討論的人有宰相,有博士,也有音樂奴隸。爭論了七八年,沒有得出什麼結論。但那一次的討論會,毫無疑問,是促進了隋唐兩代的高度的音樂文化的。

歷史上的引證太多了,說來使得大家沉悶,我不準備多說了。但我要請大家回憶一下在解放前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活動的近狀。在那短短的三十年的期間曾經有過不少次的激烈的論爭,有時是對敵的戰鬥的。戰鬥和論爭的成就是怎樣呢?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已經說過:“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毛主席的講話是有分寸的,他肯定了五四以來的文化活動的成就,然而絲毫也沒有誇大它的成就。五四以來的文化活動是把封建文化和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了,“力量逐漸削弱”了,然而並沒有把它們消滅。

解放以來的情況是怎樣呢?幾年來在廣大知識界進行了思想改造運動,馬克思主義思想有了廣泛的傳播,這是必須肯定的成就。但是和別的部門在建設事業上的蓬蓬勃勃的發展比較起來,我們的學術文化部門在思想論戰方面的空氣却未免太沉寂了。對於資產階級錯誤思想我們既沒有進行有系統的、認真的批判,甚至還有人採取了投降主義的態度,而在各種文學藝術團體

內部、各種學術研究機構內部、各種報刊和著作上面，都很少看到有不同意見的論爭。

缺乏論爭是不是由於缺乏不同的意見呢？顯然不是的。各個文化領域裏面，大大小小的各種問題，各種不同的意見很多。例如拿歷史研究來說，關於古代史的分期問題，關於近代史的分期問題，關於漢民族形成的問題，等等，國內國外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便有不少的不同意見。又例如在經濟方面，在目前正討論着的關於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問題，單是“學習”雜誌社聽說便積累了八十多篇稿子，最近已採取了一項很好的辦法，出了一期“專輯”。

這就說明，在我們的各種文化領域裏面是有各種不同意見存在，但沒有很好地展開討論。

為什麼沒有很好地展開自由討論呢？不少的同志已經提到，由於我們在思想上有不少的弱點。首先是對敵對思想採取了投降的態度，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其次是權威感作怪：對一些“大人物”感覺着他有權威，不好讓人碰他；或者自封為“大人物”，感覺着自己有權威，不肯讓人碰我。再其次是情面問題：對於同志和朋友照顧得太多，因而對於非朋友和非同志便自然照顧得太少。再其次是在暗默中採取了無原則的多數表決：假如一個問題有多數人是主張甲，而少數人是主張乙，那少數人便會無批判地被認為多此一舉；處理問題，像這樣不從真理的標準出發，而是從便利的算盤出發。有了這些思想上的弱點，那必然的結果便是阻止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執行和進展；便是輕視“小人物”，壓抑青年，而終至於脫離羣衆；便是無原則地抹殺少數人的不同意見，形成假相的多數，只許我批評而不許你反批評。這樣下去，自由討論自然就無法展開，不同意見也就會被關閉進保險箱裏去了。

今後我們要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就須得有步驟地想出一些具體的辦法出來，逐步消除這些障礙，消除我們思想上的這些弱點。

(四)

再從積極一方面來說，爲了自由討論能够順利展開而不發生偏差，我們就還須得盡力提倡建設性的批評。

我們一般的朋友似乎不大習慣於討論，也不大習慣於批評。每每一批評便是相罵，一討論便是吵架。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厭惡批評和迴避討論的情緒，似乎是無可否認的。這也就是須得消除的一種障礙。

建設性的批評要怎樣才能建立呢？我想提出這樣十六個字，請大家考慮。那就是：明辨是非，分清敵友，與人爲善，言之有物。

學術批評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明辨是非。要明辨是非，我們就必須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標準。或許有人會說：我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那就沒有資格參加批評了。不，不懂，就加緊學習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是不拒絕任何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也並不是不可能的難事。一個人只要肯有系統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在實踐中深切體會，竭誠地擁護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擁護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存心爲人民服務，爲國家建設服務，抱着自我犧牲的精神，在自己的學術崗位上或文藝崗位上實事求是地進行工作，那他的思想、立場和方法就會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轍。馬克思列寧主義歡迎犧牲自我的人，歡迎實事求是的人，歡迎勤勞不息的人。不論“大人物”或者“小人物”，不論黨員或者非黨員，在真理面前是一律平等。誰都有權利，根據真理來作是非的判斷。

要達到明辨是非的目的，我們還必須分清敵友。這就是說：當我們執行批評的時候，在對人的態度上也要採取辯證的方法。我們的敵人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反動思想，我們一定要毫不留情地集中火力來打倒它。對於願意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朋友，我們應當歡迎；如果他們在思想上有錯誤，我們應當採取說服和幫助的態度。對於自己人乃至自己，如果犯了思想上的嚴重錯